共享经济的本质、 资本逻辑与未来演进

王金秋

摘要：本文将共享经济的典型模式定义为：以 Uber 和 Airbnb 为代表的企业通过在线平台不再需要购买固定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重新将个人生存资料商品化而盈利。这种模式起源于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政策下资本和劳动力过剩危机，因此，其本质仍然是以货币计算的商品和服务交换体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享”。为缓解这两重过剩危机，资本主义通过创造新的劳动形式、扩展工作的时间和空间以及不断加剧工人异化等方式试图将剩余价值过程延伸至社会生活的新领域。共享经济内嵌着原始积累的形式，成为资本进一步攫取剩余价值的新空间。

关键词：共享经济 资本逻辑 原始积累 新自由主义 资本主义社会关系

一、引言

共享经济作为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学术讨论。西方主流学者认为，共享经济是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意识加强以及互联网和相关信息通信技术无所不在的推动下出现的。^①它通过数字化平台降低了供给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成本，包括搜寻成本、联系成本和签约成本，^②并通过评级和声誉系统而不是昂贵的品牌效应来减轻与陌生人交易相关的风险^③，同时，平台将为劳动者提供灵活工作的机会。^④因此，共享经济被预示为“可持续发展的新潜力”^⑤，并最终

① B. Cohen & J. Kietzmann, “Ride On! Mobility Business Models for the Sharing Economy”,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Vol. 27, No. 3, 2014.

② B. Rogers, “The Social Costs of Ub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Dialogue*, Vol. 82, No. 3, 2015.

③ J. J. Horton & R. J. Zeckhauser, “Owning, Using and Renting: Some Simple Economics of the ‘Sharing Econom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6.

④ K. Dervojeđa, et al, “The Sharing Economy: Accessibility Based Business Models for Peer-to-Peer Markets”, *European Commission Business Innovation Observatory*, No. 9, 2013.

⑤ H. Heinrichs, “Sharing economy: a potential new pathway to sustainability”, *Gaia*, No. 22, 2013.

[收稿日期] 2018-07-30

[作者简介] 王金秋，经济学博士，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
北京 100037

能“超越资本主义”^①。而批评性的观点主要包括共享经济模式下企业对传统行业、城市社区、平台劳动者的破坏作用。杰夫·诺南指出，Uber 和 AirBnB 等企业模式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未来的替代品，而只是一个利用监管漏洞来增加盈利能力的新业务^②；朱丽叶·肖尔探讨了共享经济的三个负面影响：共享平台对劳动的剥削、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以及日常生活商品化。^③从文献中呈现的这种对立和矛盾其实只是共享经济表面的冰山一角。监管制度冲突背后资本与工人关系方面一些深刻的政治经济变化，才是“共享经济”的核心问题。本文将共享经济置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背景下，探讨共享经济的资本扩张逻辑。

二、共享经济的内涵、产生背景及本质

（一）共享经济的内涵：争论与统一

目前，关于共享经济的概念范畴并没有统一的界定，经常被用作包含不同但可能重叠的非正式经济活动类型的术语，诸如分享经济、按需服务、协同消费、循环经济、维基经济、再分配商品、点对点、众筹、众包、用户生成内容（UGC）等。按照皮埃尔·古丁的解释，采取广义或狭义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者的意识形态立场或学术研究重点^④。但从已有文献看，大部分学者遵循着富切尔·博茨曼和路·罗杰斯的思路或继承或修正。富切尔·博茨曼和路·罗杰斯在《共享经济时代：互联网思维下的协同消费商业模式》一书中认为，通过在线对等平台将消费者自己的资产转变为消费者共享资产，能够更有效地利用闲置的资产（既包括固定资产也包括其他资产如时间和技能）^⑤。之后，柯恩·弗兰肯等人对共享经济进行了概念化，明确指出，共享经济是消费者相互允许临时访问其未充分利用的实物资产，包含消费者、共同使用、未充分利用的资产三个要素^⑥，从而将共享经济的核心定位于对闲置资产的充分利用。

本文同样遵循经典作家对共享经济的核心含义的定位——对闲置资产的充分利用，并将其置于政治经济学的模型下重新解释为：在线平台企业的运营模式不再需要购买固定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重新将个人生存资料商品化，典型企业是 Uber 和 Airbnb。这种解释分离出以社区为导向的非资本模式，将共享经济的出现聚焦于对资本与工人关系的影响上。在 Uber 和 Airbnb 这两个典型企业中，资本主义性质的这种差异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这种所有制结构是共享经济的独特组成部分。尤其是在 Uber 服务中，司机被定义为独立供应商，而不属于企业员工，企业节省了劳动力成本，同时仍从劳动者的劳动中攫取利润。

（二）共享经济产生的背景

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增长停滞不前以及高通胀使资本主义面临自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的首次重大危机。在基于这场危机的改革中，受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启发的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市场化解决方案明显获得青睐。“经济新自由主义者将危机归因于强大的工会垄断者所带来的市场机制的扭曲以及政府对经济体系的过多干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减少政

① J. Mathews, “The sharing economy boom is about to bust”, Time, 2014, June 27.

② 汤姆·斯利：《共享经济没有告诉你的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42、68 页。

③ J. B. Schor, “The Sharing Economy: Reports from Stage One”, Unpublished paper, 2015.

④ P. Goudin, “The cost of non-Europe in the sharing economy Economic”, Social and Legal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No. 01, 2016.

⑤ 富切尔·博茨曼，路·罗杰斯：《共享经济时代：互联网思维下的协同消费商业模式》，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65-66 页。

⑥ K. Frenken, T. Meelen and M. Arets, “Smarter regulation for the sharingeconomy”, The Guardian, 2015, May 20.

府支出来修正这次危机。”^① 这种新自由主义方法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可以说是结构性的，其特征还表现在国有资产私有化，贸易制度自由化以及放松对工会和劳动力市场的管制。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近 30 多年来社会经济的主导模式。新自由主义作为阶级统治和国家政权的一种特殊形式，不仅对先前的制度框架造成了“创造性毁灭”，而且“摧毁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供给、技术混合、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再生产活动、土地归属和情感习性”^②。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中契约关系的重要性，试图把一切日常生活都纳入市场领域，从而为过度积累的资本（表现为过剩的资本和劳动力）打开广阔的盈利空间。正是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下，资本家不断调整和改造技术硬件（机器和计算机）、软件（积累、储存、传递和分析的程序和数据库）以及它们的组织形式（尤其是管理劳动力运用的命令和控制结构）。20 世纪 70 年代后，制造业试图通过减弱劳工力量和转向日益精益的商业模式来恢复。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科技公司也开始转向商业模式，并在权力和资本的支配量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共享经济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因此，共享经济的出现不是信息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资本主义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必然结果。

（三）共享经济的本质不是共享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那样，虽然商品存在于各种阶级社会中，但只有在商品生产变得普遍化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存在。商品概念中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另一个关键支柱——私有制问题。如果一个产品可以被提供交换，它必须首先属于寻求这种交换的生产商或所有者。同时，商品所有者之间交换的总和构成了资本主义市场，货币和信用是保持商品流通的润滑剂。资本家通过剥削工人阶级获取利润以及与私有制有关的驱动力。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要素：商品生产和交换、私有制、市场、货币和信贷、利润和资本雇佣劳动关系。当前的共享模式——Uber 向出租车司机收取 20%~25% 的佣金；Airbnb 向房主和房客分别收取 3% 和 6%~12% 的房客服务费，Taskrabbit 从每个工作任务佣金中收取 20% 的服务费用——并没有改变或废除私有制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基本关系。从根本上说，它仍是市场经济典型的货币交换商品和服务体系。

因此，Anthony Kalamar 称，共享经济并不共享，而只是共享掩饰（sharewashing），是一种类似绿色掩饰（greenwashing）^③ 的意识形态实践。在这两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自然破坏和劳动剥削都以环保和赋权来掩盖。在这个过程中，真正的共享经济——基于公有制和生产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能性被搁浅一方。虽然这些“共享”企业可能有助于减少某一部门的浪费，但在社会层面上，不断扩大市场导致“实际共享经济的承诺与以共享寻求掩饰的企业之间的关键差异，是后者不可避免地涉及货币交易。和所有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一样，共享经济企业为获取利润，一直寻找新市场，开发新产品，寻找新方法扩大消费”。^④ Evgeny Morozov 称其为“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类固醇”，即把曾经置于“保护层”下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汽车、房子甚至空闲时间都转化为不受管制的、以货币计量的自由市场经济。

^① Geoffrey Ingham,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p. 196-197.

^② 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年，第 3 页。

^③ sharewashing 是由分享经济 sharing economy 和动词 whitewash 混合而成的词。它可能源自 greenwashing。这一术语第一次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用以指企业以环保意识方式宣传掩盖他们真实的意图。因此，这里有一个明显的相似之处，即企业用“绿色”和“共享”的积极概念，隐藏其真实的攫取利润的目的。参看 A. Kalamar, “Sharewashing is the New Greenwashing”, Opednews, 2013, May 13.

^④ E. Morozov, “The ‘Sharing Economy’ Undermines Workers’ Rights”, Financial Times, 2013, October 14.

三、共享经济的资本逻辑：原始积累的再现

（一）共享经济中资本扩张的途径

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逐和长期困扰其的积累过剩，意味着它必须不断发掘新的商品形式，为过剩资本找到新的循环空间和盈利途径，必须不断加强雇佣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的分离，开拓社会生活的新领域。然而，资本在日常生活中的扩张和再生产以及资本对社会生活新领域的殖民化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关于共享经济模式的思考有助于将隐藏在其背后的资本扩张途径显现出来，因为其本身的发展促进了新的积累模式。

首先，共享经济模式创造了新的工作类型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途径。例如，TaskRabbit 通过开发“分布式劳动”将劳动者与需求者匹配，将平台劳工归类为“微型企业家”而不是“雇员”，从而避免了提供劳动力技能培训以及设备的义务。实际上，这些企业只是利用由于资本主义危机而产生的大规模失业和普遍存在的低工资的非生产性劳动，从而从社会停滞的征兆中牟取暴利。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批判地指出，将共享平台劳工视为微型企业家，也就意味着将工人与资本家混同为一体（workers and capitalists in one persons）^①，这种观点忽视了马克思对于资本家的本质分析。马克思说，“如果资本家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他就不过成了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②，“由小业主变成资本家，从而使资本关系在形式上建立起来，需要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单个资本。”^③ 福克斯认为，共享平台劳工只拥有少量资本或根本没有资本，并且是自我雇佣，例如，Uber 司机利用自己的生产资料——汽车——进行维持再生产活动。而作为微型企业家，需要拥有足够的资本才能够利用和剥削他人。“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发展成为对劳动，即对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或工人本身的指挥权。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监督工人有规则地并以应有的强度工作。”^④ 因此，共享平台劳工从来都没有足够的资本变成资本家从而使资本和劳动任务分离。

其次，共享经济模式扩展了工作的空间和时间。互联网信息的出现，允许跨空间距离而没有时间延迟的协作，能够实现多种形式的活动和新的合作方式^⑤。在互联网信息技术条件下，劳动对象的工作可以在全球无障碍的信息系统中完成，劳动也在信息空间本身进行，互联网成了工作的新场所，办公室成为广阔工作空间地图上的一个点。通过网络平台或智能手机延长工作日已变得如此普遍。奥多诺等人质疑了霍尔和克鲁格关于 Uber 司机每小时收入的数据^⑥。他们计算发现，在美国最大的三个市场底特律、休斯敦、丹佛，司机扣除包括车辆折旧、保险、维护和汽油费等费用后，平均每小时收入仅为 13.25 美元，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扣除费用后，每小时约为 20 美元）。^⑦ 弗力克斯·萨尔蒙通过估算也认为，如果旧金山的 Uber 司机年收入达到平均水平 7.5 万美元，每天至少要至少工作 11 小时以上。^⑧

最后，共享经济模式加剧了工人的异化。工人与工作异化的同时，共享经济规模的扩大也使工人之间更加异化。在共享经济模式中，通过一个应用程序、一系列程式化算法或配置文件，使社会领域

① C. Fuchs, "Social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2017, pp. 286.

②③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357 页，第 383 页，第 359 页。

⑤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466-568 页。

⑥ 霍尔等人通过计算得出，Uber 司机每小时的收入在 16.89 美元至 18.31 美元之间，具体工资取决于驾驶时间。参看 J. V. Hall & A. B. Krueger, "An analysis of the labor market for Uber's driver-partn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Industrial Relations Section Working Paper, 2015.

⑦ C. O'Donovan & J. Singer-Vine, "How Much Uber Drivers Actually Make Per Hour", BuzzFeed, 2016, June 22.

⑧ 汤姆·斯利：《共享经济没有告诉你的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72 页。

中的一切都可商品化，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变成了由商品和货币支配的物化关系。这样，共享经济通过智能手机或网络可以将劳动者无缝地融入现代的工作世界。共享经济促进临时的就业模式和自我剥削，通过互联网将工人与资本家联系起来，而不需要固定成本和更传统的雇佣关系的情感投资，模糊了生产与消费、工作和休闲、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界限。布雷弗曼曾深刻地揭示，“资本家在人类劳动的这种无限适应性中找到了扩大资本的基本资源”^①。智能手机或网络已经成为激活人类劳动延展性的主要机制之一。

（二）共享经济新的积累模式

共享平台下资本所有权性质的改变——企业不再拥有或不再需要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固定资本和雇佣劳动）——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共享经济的特征是所有权转换成使用权。经营这些共享平台的企业将租金作为利润来源，这是共享经济与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企业的差异：资本家的利润不是来自剩余价值的生产，而是以一定比例分享已实际产生的剩余价值，即共享经济并不创造新的价值，而是仅仅重新分配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已经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随着共享经济的兴起，这种大规模的寄生性寻租资本主义也逐渐兴起。共享经济的主要“革命”是把个人财产变成私有财产，也就是把数百万劳动者的个人财产（如住房、汽车等）变成资本家的利润来源。简单地说，就是小规模个人财产向资本的大规模转化。

由于资本化的共享经济涉及重新商品化私人住房和交通工具，构成了一种原始形式的积累力量，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扩大到社会生活的新领域，是“原始积累”形式的再现。杰森·里德扩展了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是“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的判断，认为“作为历史进程的原始积累并不仅限于从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而且存在于生存资料转化为生产资料以便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中，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资本主义模式的延伸通过殖民化和社会化的方式在地理上进入新的空间构成社会变革的方式”^②，“原始积累这一术语不仅是一个事件，而且是一个过程，征用和立法必要摧毁其他经济和社会关系，使其生产资本。因此，原始积累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而且是结果。”^③这种对原始积累的理解使资本主义将社会关系新领域定居于剩余价值的过程中。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通过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渗透到现有的社会组织（如规则合同和私有财产安排）”，提供了一种资本主义可以“吸收现有资本和劳动力剩余”的手段^④。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始积累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保护自身免受内部危机困扰的过程。正如前面所述，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性，工会强度下降，放松管制等所有这些劳动力市场不安全形式与劳动阶级依赖于工资劳动意味着必须购买资本家生产的商品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潜在危机，而共享经济的出现成为了缓解危机的一个方案。共享经济通过提供经济平台减少企业总成本，并通过将劳动者生活资料重新商品化来获得额外的利润，这又进一步巩固了新自由主义政策。一方面，企业把资本投入共享经济中，成为纯粹的食利者阶层，反映了生产资本的巨大过剩；另一方面，则是赤裸裸的相对过剩人口和产业后备军。资本和劳动的双重过剩，在形式上又表现为日益增长的共享经济。但是这并不预示着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动态阶段，相反，它表明资本主义已经处于发展生产力、工业、科学和技术的僵局中。简言之，所谓的共享经济，远不是预示着一个合作、平等和共有的新时代的开端，而是标志着寄生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它掩盖了危机的结构性原因，而不是消除危机。

^① 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方生、朱基俊、关亿萱、陈卫和、张其骈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52页。

^{②③} Jason Rea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The Aleatory Foundation of Capitalism," *Rethinking Marxism*, Vol. 14, No. 2, 2002.

^④ Davi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Primitive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Socialist Register*, No. 40, 2004.

四、共享经济能超越资本主义吗？

（一）共享经济离社会主义有多远？

共享经济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计划的第一个重要区别是，在共享经济所涵盖的部门内，资源分配可能更有效率，但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共享企业的生产不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是为了赚取利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投资不是基于需要，而是由于某些商品的供求不匹配以及资本家根据各部门利润率不同而注入不等额资本赚取超额利润的可能性。这种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呈现出的事实表现为：大量的失业与过度劳累；在大企业手中闲置的资金和过剩的产能，以及工人支出紧缩。因此，从有效性的角度考察，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着巨大的资源浪费。这证明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中概述的一般观点：“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① 换句话说，现存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具有的法律关系即财产关系，已经不适应资本主义创造的技术和科学潜力。马克思指出，这样的矛盾是“社会革命时代”的曙光。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梅森等人的设想——有效和平等地分配资源、以合理的方式民主地运行生产——具有了可能性。但是，只要信息技术、金融部门等被垄断在私人手中，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就将继续统治。

共享经济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计划的第二个重要区别是，碎片化的分工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分工水平的测量器，导致了当今工人对工作的高度异化感。劳动生产力和创造力虚假地从属于对其产品的迷恋，同时，工作的剥削和工人之间的疏离隐藏在对自愿和自主交换的意识形态背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② 而在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解释，“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③ 但是恩格斯强调，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组织所代替，“人类从必然国度到自由王国的上升”^④ 才是可能的。只有这样，“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⑤ “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⑥ 于是，只有人性自由，我们才能个人自由。只有当我们掌握生产资料、社会技术和财富的时候，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7页，第537页。

^{④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5页，第564页，第564页。

（二）共享经济的未来演进：后资本主义、合作共同体还是平台合作化？

对于资本主义模式下共享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差距，保罗·梅森、杰里米·里夫金和朱丽叶·肖尔给出了跨越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后资本主义、合作共同体和平台合作化。

保罗·梅森在《后资本主义：通向未来之路》^①一书中指出，非市场力量的扩张和信息经济的扩散预示着新经济范式的出现：后资本主义。其出发点是断言当前的技术变革对资本主义经济至少有三大影响：首先，信息技术减少了人作为劳动者的需要，机器自动化正以惊人的速度替代劳动者的工作；其次，信息产品正在侵蚀市场价格机制的正常运行，网络信息的一个特点是它可以被无限次免费复制，在拥有共享信息产品后，经济学的基本法则——供给和需求建立在稀缺性的基础之上——将被打破；最后，协同生产，如开源软件、维基百科的自发兴起，预示着非市场形式的合作将产品从利润动机中分离出来，通过非管理生产在正常市场机制之外创建一种便利社会的机制。这个“后资本主义”经济的种子已经存在于当前资本主义中，正如资本主义在封建制度中曾经发生的一样。梅森称，工人们联合起来反抗精英的革命模式已经过时了，相反，技术和网络正以一种异常强大的方式把人们联系起来。他希望凭借网络化力量建立一个更加平等、公正的世界，一个不再受“市场新自由主义信条”支配的世界。

同样，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②认为，通信互联网与能源互联网及物流互联网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共享通信、能源和物流基础设施的物联网，这个网络就可以接近于零的成本运行，并全面实现其他方面的共享潜能，包括收取租金、再分配网络、文化交流以及职业技能和技术交流等。里夫金预测，当协同共享经济的比重达到10%~30%时，在世界贸易体系中，高度垂直化一体化的跨国公司就可能相继消失，有80%的电力将以智能电网联网的方式运输，人类进入更稳定的“碳后时代”。当这一切都成为现实，协同式生产和交换将迅速从利基产业领域普及到支柱产业领域，而资本主义将从共享机制中重新获得活力，并且将是唯一的方式。

朱丽叶·肖尔认为，“要想建立分享与合作生产和消费体系，需要使平台的所有权和治理民主化”^③，即通过平台合作化的运动驱动和扩大平台参与者拥有和管理这些平台。历史上，合作社已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在经济特别是保险和农业领域中具有可扩展性。合作社的关键优势是，与营利平台相比，用户收益更高。因为合作社的利润在用户之间再次分配，特别是平台合作社用户节省了商业平台收费（一般为15%~20%）。此外，用户可以保留对其操作生成数据的所有权，可以通过让工人拥有和控制平台，决定最低工资、工作时间和保险来避免剥削行为。具体措施是，通过平台合作化运动废除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财产关系，实行涉及共同所有制和民主工人控制的生产计划，即将共享经济的大型牟利企业国有化，变成公共服务。例如，Uber国有化，成为民主控制的公共交通网络（包括火车、公共汽车和出租自行车）的一部分，那么，公共交通可以以低成本计划高效率运转；司机可以保证体面条件和生活工资，而不需要彼此竞争；最终，通过自动化和无人驾驶汽车，司机可以全部更换，并提供培训和教育，以进入其他工作。

其实，无论是梅森关于后资本主义、里夫金关于合作共同体的设想，还是肖尔关于平台合作化的构建，都认为资本主义将逐步被这种新型经济日益削弱后的混合阶段，而不是被社会主义所替代。他们注意到，信息革命创造了信息丰富的低成本和劳动力节约的经济以及资本主义市场和垄断者无法整合这一信息革命的矛盾。然而，他们并未详细论述西方社会该如何抵达这种后资本主义世界，也没有试图解决当今工会和左翼团体日益忧虑的一个问题——技术正使许多劳动者变成没有保障的“数

^① P. Mason, "PostCapitalism: A Guide to our Future", Penguin, 2015.

^② 杰里米·里夫金：《零成本社会》，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65，243-244页。

^③ T. Scholz, "Platform cooperativism vs. sharing economy", Medium, 2014, December 4.

字农奴”，而不是相互协作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人。这种乐观的“技术决定论”假设已经开始掩盖了技术上的对等生产可能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这种描述仅在将其从现存的社会经济关系中抽象出来时才起作用。事实上，资本主义一直是在物质丰富的情况下制造稀缺，关键在于如何废除物质不平等分配的财产安排。尤其是梅森将后资本主义的成功归于网络化，这种需要高等教育的网络，只有在提供了一定的学校教育和基础设施标准的社会才能实现。在一个由资本剥削和分配的极不平等的世界，梅森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再分配过程如何运作是完全不确定的。没有迹象表明遭受战争蹂躏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钴矿工将从一个合作的、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中受益。^①正如布雷弗曼明确地警告我们：“只有通过一方面对技术和机器，另一方面对各种社会关系，同时对这两者在现存社会中搞在一起的方式，从历史上逐一加以具体分析，才能有效地着手去解决。”^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新路径能走多远，取决于它能否在资本逻辑之外，组织工人阶级的斗争。

五、结论及对中国共享经济发展的启示

对共享经济的资本主义批判表明，共享经济仍然是由自由市场经济下的货币交换体系计算，因此，共享经济的本质不是共享。对等平台下的货币交易是一种新的购买和销售方式，它不仅破坏了旧的监管制度，而且是一种原始形式的积累力量，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扩大到社会生活的新领域。这种资本主义现实隐藏在对技术的拜物教理解中，作为满足需求的积极力量和释放对等分享的潜力，在资本主义现实形态下并不能实现。

当前，中国共享经济的规模已占 GDP 的 1.59%，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柱。如何实现共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一步。一方面，中国共享经济的发展必须与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的共享发展理念融合，做到共享的主体是人民，充分利用共享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优势，探索其与公有制经济结合的具体形式。西方发达国家共享经济发展给劳动者带来的诸多负面效应，归根结底都是由共享经济的资本主义属性这一制度内核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共享经济过于强调市场的作用，忽视了政府调控在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共享经济的发展要依靠人民，必须通过发展教育、医疗住房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具体措施，改善人民的生存发展空间，提升广大人民的发展水平，实现社会发展与人性发展的统一，避免走资本主义资本和劳动的修复道路。

（责任编辑：王云川）

^①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 176.

^② 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9页。